

军政府造汉

字铜元设计简约、美观、时代感强。

诞生于成渝厂局，

后波及天水、恩

施及川内外军阀

绅商。是民国时

期四川铜元中铸

行时间最早、最

长、面值最全、

版式最为复杂、

低仿臆造最多、

流通最广、系列

性极强的货币大

系。肩负着改朝

换代、稳定时政经

济发展的大任，

见证了军阀纷争

和百姓辛酸的史

实，是辛亥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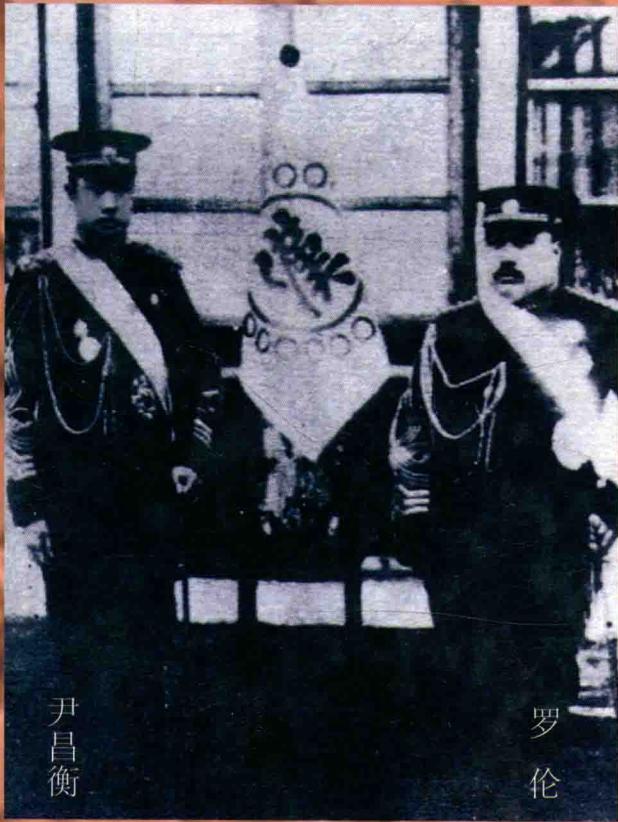
后极具特色的

地方『流通纪念

币』。

醒狮

中国铜元分类研究——军政府造汉字铜元



纪念辛亥革命105周年 汉字铜元发行104周年

汉字铜元

宋伟杰 著

CHINESE CHARACTER COPPER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中国·成都

中国铜元分类研究——军政府造汉字铜元
CHINESE COPPER COINS:A NEW CLASSIFICATION—
CHINESE CHARACTER COPPER MADE BY THE STRATOCRACY

汉字铜元

CHINESE CHARACTER COPPER

宋伟杰 著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中国·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汉字铜元 / 宋伟杰著. —成都 :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 - 7 - 5504 - 2278 - 0

I. ①汉… II. ①宋… III. ①铜币(考古) — 研究 — 中国 — 民国

IV. ①K87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7911 号

汉字铜元

HANZI TONGYUAN

宋伟杰 著

责任编辑: 张明星

助理编辑: 杨婧颖

封面设计: 宋伟杰 李秋潼

责任印制: 封俊川

出版发行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街 55 号)
网 址	http://www.bookcj.com
电子邮件	bookcj@foxmail.com
邮政编码	610074
电 话	028-87353785 87352368
印 刷	成都市拓展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210mm × 285mm
印 张	16.75
字 数	695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504 - 2278 - 0
定 价	26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在呼和浩特的学生时代，我因喜欢纸币和邮票，节假日常去相关市场猎奇。1995年我在地摊上第一次见到汉字铜元，是百文，摊主称其为“十八圈”，认为风格独特，遂一元买来留念，此后再未遇见，或未留意。不曾想，2008年年初在重庆地区的一家古董店里再次见到了一枚，同是百文，传世品，币面金黄，甚为喜欢！由此，在这个汉字铜元的发祥地（成渝），我开始了追逐它的梦想。藏品日丰，发觉汉字铜元版式浩繁，尤如川剧的变脸，玄妙莫测，于是提起了极大的研究兴趣。可以说，在每个爱好者手中的汉字铜元，能找到两枚相同的版式是不容易的，它们总是有一些小的不同，可见当时使用的模具之多，铸量之大。如此复杂的版式构成，在变化中寻找规律难度极大，我曾有多个构思，一再完善。由于相关历史资料欠缺，我更多的是从美学角度分析设计的演变，结合分类学，铸造工艺等，抓大放小，建立“树式”概念，进而有效并科学的掌握汉字铜元版式全局。

“汉字铜元”是四川铜元大系中的一个分支，历史厚重。民国元年四月（1912年）始铸于成都造币厂，民国二年（1913年）重庆铜元局开机，分别止铸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民国十五年（1926年年初）。此间，本省私厂林立，外省低仿臆造，杂版重生！铜质和铸工参差，虽不及成渝合法厂局之质量，但也混同流通于市。四川民国货币金融可谓是一部波澜的史诗，谱写着那个时代的辛酸！辛亥革命成功后，民生亟待复苏，然，民五军兴，军饷庞大，相讨不断，民不聊生！民国七年（1918年）防区制正式形成，驻军就地筹饷，更谱写了一段没有圜法的川省货币历史，物价持续上涨，铜元一再贬值。虽有多次整治私铸行动，效果皆不明显，波及周边行省。民国十四年小200文铜元开铸后，达到了川省军阀掠夺财富的极致，直到民国二十年（1933年年底，长达17年的四川军阀混战和所谓的防区制度才告结束，川政统一。蒋入川后，财政部接收成、渝两造币厂，令停铸川版。

“汉字铜元”系军政府造。军政府（Stratocracy），又称军政、军人专政、军阀政治，是一种由军人担任国家元首，由军队进行直接控制的政府形式。它是一种军事政府，绝大部分军政府是经过政变而建立起来的。军政府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实施军事法律，或宣布永久性紧急状态。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有过“军政府”的历史，中国也不例外。清政羸弱，内忧外患，邹容的《革命军》（1903年），同盟会的《军政府宣言》（1906年 参见第四篇·附录1），四川辛亥保路运动（1911年），先后为武昌打响第一枪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湖北军政府成立，各省纷纷响应，清帝退位。百业待兴的同时，民国铸币史拉开了帷幕。

四川自古是中国的大省，横跨长江，巴蜀文化底蕴深

厚，金融业发达。铜元的铸造始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与银票、银元同作主币行用。辛亥革命（1911年）后，重庆、成都先后独立，随即，立宪派翻砂铸造了少量的“大汉”及“大汉纪元”两种方孔制钱。1911年12月，因士兵索饷哗变，库中无存，军政府印制了一年期限的“军用银票”兑换券以救急。1912年5月（民国元年四月），开机铸造铜元，废除旧式模型，设计了以“汉”字义旗图案为主要元素的新式模具。四川境内短暂的金融修整后，又进入军阀混战时期，以防区制为其祸根。北洋纷扰，军阀割据，实力军阀更迭统理川省军民两政，具有先进铸币设备的成都“四川造币厂”和重庆的“铜元局”，成为各军阀势力争夺的焦点，为此战事频繁，割据迭起，外省军阀（主指滇、黔，1915年12月25日作为讨袁护国军入川）作为某支势力的友军也参与其中，亦或渔翁得利，同时，断续霸占着厂局，满足私囊和军饷之需。铜元及其它货币的风格随着易主而演变，加大面值、降低成色、减轻重量，低劣铜元不断充斥金融，剥削黎民膏厘，私铸屡禁不绝。民国六年（1917年）至蒋介石国民政府成立期间，驻军就地筹饷，设行发钞，各自为政，货币金融的紊乱名列全国之首。直到民国十五年（1926年），经重庆商会建议，短时间生产了十文，二十文汉字铜元后，川内便成为了“小200”的汪洋。至此，汉字铜元停铸，大量前期铜元被熔铸或改铸。《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描述：进入民国后，四川陷入军阀割据局面，大小军阀为筹措军费，除横征暴敛之外，便是纷纷自行设厂铸币。币制极其紊乱，由各地军阀私设的造币厂数十百家。

“大而师旅团部，小而县署乡场无不自购手摇机，收买制钱，任意滥铸，以供支用。”（注：《四川军阀史料》也有相类似的载录，原载《辛亥革命后四川四十年大事记稿》）

由于“军政府造四川铜币”的设计，具有划时代的纪念意义，特别是背版十八圈（寓意18行省）围绕的篆书“汉”字，表达了革命的意愿，百姓的心声，川民乐用，邻省关注，影响多方铸币。驻守在天水的孔繁锦（甘肃督军张广建的心腹）在没有获得铸币权的情况下，大规模仿制范铸四川铜币，后又机制了一定数量的汉字铜元，风格自成一体，流通于甘肃大部及川陕等边贸，“文”“都”两版是其特色；湖北恩施地区及周边的军阀、革命军、民间势力以及四川入鄂军阀采用各种铸币方法，大量仿制了成色不等系列性较强的汉字铜元。有纪地为“湖北”，亦有纪地为“四川”，又有中花位置圈一“鄂”字双纪地者，版式繁杂几近成渝，是汉字铜元体系中极具特色的又一分支。主流通“施鹤七属”及川鄂边等地区，今日的重庆地区仍然不难见到四川纪地的湖北版式；史料载，贵州的大铜元为川省输入，其仿制亦有可能。邻省竟相仿制，可见汉字铜元深入民心，影响之广。



总体来说，汉字铜元就是军阀的产品，体现了一个时期地区的经济面貌及军阀势力。厂局的产品为主流货币，属“正版”，我们称之为“官版”（四川造币厂的产品，称为“厂版”，重庆铜元局的产品，称为“渝版”或“局版”）；防区或民间的产品为非主流货币，统称为“军私版”（同时包括川边及邻省铸品，此类在版式划分中有区分）。在本书中，以官方产品的版式作为重点研究对象。

时隔百年，相应的资料不全面，复杂的版式，导致了课题的难度和深度。汉字铜元似是挖不完的宝藏，分类的精准，难度有如行走蜀道。一批泉界爱好者自发研究着这段历史，不断深入发掘补充，逐年细化完善。版式的研究及收藏已成为当今弘扬中国钱币收藏文化的必然发展趋势，各类钱币的分类研究将持续升温。

相关内容的铜元书籍最有成者当推伍德华、四川钱币协会及段洪刚先生的著作《中国当十铜元》《四川铜元研究》《中国钱币大辞典·民国篇铜元卷》，普及并影响着研究者的深入研究和爱好者的收藏。此外，湖北王伟先生对湖北恩施版有着较深入的研究；北京王爱学先生对版式纲目界定及甘肃机制币推论都有着不小的贡献；甘肃刘大有、张通博先生等对甘肃版式研究的深入及尊重历史的态度实为可敬；“lgo”、王玉峰、“荆泉123”、夏隆岩、“添之彩”、“聚币堂”、“重庆胡笳”、杜小钢等一批研究者和爱好者对成渝版式的细目研究及推广不可小觑！

金融与货币流通是国民经济的一面镜子，军政府造汉字铜元是民国军阀历史的文化载体之一，简约、美观、时代感强。它诞生于成渝厂局，后波及天水、恩施及川内外军阀、民间势力，是民国时期四川铜元中铸行时间最早、最长、面值最全、版式最为复杂、低仿臆造最多、流通最广，系列性极强的铜元大系。它肩负着改朝换代，稳定时政经济发展的大任，见证了军阀纷争和百姓辛酸的史实，是辛亥革命后极具特色的地方“流通纪念币”。

研究钱币史，发掘和弘扬地方文化，由一枚铜饼，一个印花，查证一段铸币史，了解当时，镜照当今，取其益处，深研金融利国之道，同时对钱币爱好者来说，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当看到伍德华这位美籍犹太人在民国初期对中国铜元的热衷，以及将铜元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来研究（1926年至1935年陆续发表了英文文章，后结集出版了《中国当十铜元》一书），深感钦佩！写作的欲望涌动。伍谱对中国铜元的研究影响深远，以致今日国人仍承袭其较为科学的版式分析思路，此法最适合复杂版式搭配规律的研究。作为收藏参考书，在使用上不是很直观，对于军政府汉字铜元普通爱好者、初入门者来说，他们更关心内容的系统和重点。

本书参考并汲取了多方经验以及多种同类图谱书籍的优秀创作方法，对分类研究作了几项新的尝试。如：除总目录外，设计了分目录及支目录，可以迅速查索到图谱中的位置，总目录简洁明快，我命名为“阶梯目录”；应对复杂版式的分类，借用组织系统表的形式，设计了新式的“版式结构图”，按中花演变及年份的顺序直接明了地表述了各系列整体版式概况，复杂概念变得一目了然；同时引用了经典的

伍氏分类法，并加以优化。在伍谱的基础上，编号增加了“下标”，以示明显细目，进而突显纲目。因此，搭配图不仅更加简练，阅读清晰，更便于研究的延续性，随时增减而无需更改编号。

在文史资料方面，由于历史原因和当局对辅币的重视程度不够，厂局走马灯似的频换“领导层”，相应地本不全面的资料大量损毁或佚失而断档。加之新中国成立后，相关部门对其有关的资料整理时间较晚（如《民国时期四川货币金融纪事》一书的编辑整理是1961年开始的，“文革”十年中断，1989年11月出版，期间又被人损失了很多珍贵的资料），时间跨度大，投入上也不够，遗漏较多，更增加了民国时期铜元的谜团，尤其对首发的川省辅币“汉字铜元”的研究带来了不小的难度。目前，档案馆馆藏资料以及当年许多外国人编著的相关珍稀资料难得一见，本书尽可能比较翔实的收录并整理了相关资料。即便如此，仍有一些谜团需要今后共同努力，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书在编写的过程中，各地藏家及爱好者热情相邀，得到了多方的支持和帮助，不仅重温了历史，学习了很多之前未接触的知识范畴，最宝贵的是结识了各地众多无私朋友。

提供图片的藏家、学者有（按字母排序，不分先后）**北京**：段洪刚、舒文峰、王爱学。**重庆**：任祥彬、胡刚、肖敏、尹天昆、姚允玖、朱威林、张云生、周世武。**甘肃**：陈小江、丁得信、姚斌、张通博、王玉峰。**河北**：李卫华。**湖北**：何贵连、吕明生、王伟、余斌。**湖南**：夏隆岩。**四川**：杜小钢、黄洋、李亮、骆勇军、苏晓福、吴立成、王忠贵、谢苑材、唐亮、曾祥德、张勇、邹滨阳。**陕西**：演圣，匿名朋友略……此外还借用了诸多泉友藏品或拍卖的图片，一一拜谢！

感谢家人的理解！感谢相关的朋友们！此书承载了很多用语言难以表达的感激之情，没有你们的支持，就没有这个成果的面世！

本书宗旨是研究与实用并立，可读性强，参考性强，可深入性强。内容虽较翔实，但由于笔者藏品有限、水平有限，错漏在所难免，希望读者在参阅使用过程中多提宝贵意见与建议，以便有机会修订时做得更加完善！希望本书的创作思路能对汉字铜元的深入研究做一个基础铺垫，对今后的钱币分类研究方法做个探索性的基础铺垫。

宋伟杰 2014年5月1日于涪陵黎明路陋室



邹容与《革命军》

凡 例

一、本书收录了民国元年至民国十五年间四川、甘肃、湖北三个省的军阀及民间铸造的汉字铜元1050枚，包括“官方”和军私铸造的正式行用品、趣味品以及近现代赝品等。

二、汉字铜元分支较多，目录必然冗长复杂，为了一目了然，查阅轻松，本书简化了总目录，设置了分目录和支目录，查阅简单，搜索方便。阅读本书时，建议通篇概览，而后细观，便于理解和日常参考对照。

三、为满足各方需求，本书在伍谱分类法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面背搭配上尽可能简化易懂，各种搭配代表着一个支系，有下标字母或数字的，表示纲目下的明显的规律细目。同时，配有明快的版式结构图等，使汉字铜元不再“复杂”。

四、图谱中例举的各系列，以纲目版式为主。成渝厂局作为汉字铜元“官方”铸币单位，其产品称为“官版”，具有相对权威性，是版式研究的重点内容。四川篇按纪值→纪年→中花的变化排序，个别系列因比较常见而通常被忽略其内在的演变规律，所以例举的明显版式相对多些。甘肃篇按铸造方法的不同→纪值→纪年→中花的变化排序。湖北篇按纪地→纪值→纪年→中花及边花的变化排序。军私篇按纪值→纪年的变化排序。四川篇以外各篇图谱内容皆以纲目性例

举为主，删减了大量细目版式，小的不同，请就近参考。

五、图谱按篇章分别连续编号，如：S000，S代表四川版式，000是阿拉伯数字序号（以下同），G000代表甘肃版式，H000代表湖北版式，Q000表示趣味品，C000表示重新定义的汉字铜元，JS000表示军私版，Y000表示近现代赝品。分支编号在省份编号的基础上，第一个字母后面加一到二个英文字母代表纪值或纪地，如：SW000表示四川篇五文系列，SRS000表示四川二十文，SWS表示四川五十文，SB000表示四川百文，HW000表示湖北纪地五十文，HSW表示湖北版（即恩施版）四川纪地五十文，HSB表示湖北版四川纪地百文。

六、除第二、五、六、七章的内容外（有珍稀度的标注），每枚币均有珍稀度，五级及以上个别币种的评级和参考价被做标注，试用期一般是本书出版后5年之内。标价以“上品（F）”至“极美品（EF）”为准（与书中例举品无关），仅供基本参考，汉字铜元“原光”及深打全齿的收藏难度较大，档次相对较高，根据市场需求和心理价位收藏，品相和版式的差异是价格变动的杠杆，读者可根据一枚币的实际情况酌情增减。

本书评级对应表

珍稀度	孤品	大珍	珍罕	珍稀	珍	稀罕	稀少	较少	略少	普通
级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七级	八级	九级	十级

注：此表根据伍谱基础制作。本书图谱的版式说明中，没有标注“孤品”和“大珍”两项，“珍罕（目前仅见）”“珍（目前个位数。亦有目前仅见，但有待观察的版式注明）”皆是目前难得一见的大版式品种，系综合笔

者、互联网及诸位藏家目前经历的数量总结，因皆为流通币种，且部分品种发掘的时间相对较短，所以，其存世量有待今后进一步验证，方为客观。

参考价格与国际标准对照表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等级	1	2	3	4	5
国际	AU	EF	F	C	G
参考价	2000	200	20	10	2



注：

1. 本表摘自2007年版段乙谱，体现一枚币不同品相的价值，目前的参考价至少增加了二到三倍，具体品种依据实际情况各有增减。（注：评级与价格不一定成正比）

2. 简写英文含义如下：

AU=Almost Uncirculated 几乎未流通（近未使用品）

圆光。几乎保持出厂状态，光泽匀和、满布币面，而且没有明显氧化斑纹或刮、划痕迹，文字及图案细部清晰。

EF=Extra Fine (或XF) 特别精美（极美品）

美品。几乎没有流通过，圆光消退，但币面文字、图案细节完整，包浆纯净美观。

F=Fine 较好（普品）

上品。流通痕迹明显，但没有遭到破坏性磨损或磕碰，文字图案主体基本完整，局部有磨损或硬伤，但不影响版式特征的辨认。

C=Common 一般

中品。流通过渡，磨损或磕碰痕迹明显，局部已经无法辨认，但主要图案可以看清。

G=Good 差品

下品。受到严重腐蚀或磨损，部分文字、图案已经不完整，无法辨认细节。

此外还有VF(美品)、UNC(未使用)、BU(完全未使用)等品相差异。

七、所有相关数据，直径，厚度，重量，在文献的基础上，亲自称量做出的平均值，部分由提供图片的朋友提供。由于铜元不比银元规范，尤其是民国的铜元，时局原因或生产的批次不同导致数据差异较多，即使是同一系列也有差异

较大者，面值越大差异越多，所以多数没有单独标注，请参考平均值。(为排版美观，百文图谱例举的直径略小于实际尺寸。)

八、图谱图片直径系面值平均值，非某一系列直径，为赏鉴方便，图例中多数另加有局部放大图，也有个别为满足排版需求而略加放大或缩小，请参阅相关数据。

九、铜元换算公式：

1. 1串(钏、吊)=1 000文铜元

2. 1斤=16两=160钱。(秦始皇统一度量衡至新中国成立前一直是按16进制，新中国改为10进制，药剂行业至今沿用16进制。)即1钱=3.125克。

十、凡藏家提供的泉品，除要求匿名外，都注明了提供者的姓名，早期在网络收集的图片，包括藏品，交易品，因时间原因未能及时记录而深表谢意及歉意！如有提示，修订补注。

十一、在元素分解中，同时出现有“花型”和“花形”的不同表示。前者器形之意，指某一类的型质，后者指单独某一朵花的形状。

十二、第四篇参考文献一节里有五本重要参考资料，因无版权而未被录入，分别为：

[1] 中国人民银行编写组. 近代中国货币史资料[C].

[2] 中国银行重庆分行. 四川金融风潮史略[M]. 19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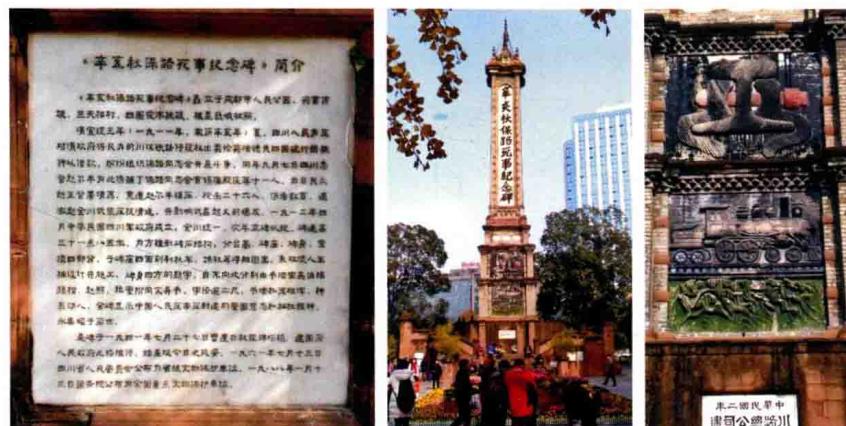
[3] 财政部钱币司章制汇编附统计报告[D]. 1930年1月.

[4] 刘大有. 天水孔币专辑[M]. 1989.

[5] 厂史编委会. 国营第七九一厂厂史 (1905~1985) [M]. 1989.

[6] 新编恩施诸县市地方志.

另参考有各相关网站拍卖、交易、交流讯息。





目 录

中国铜元分类研究——军政府造汉字铜元

学术研究·藏鉴参考·评级标价·系统全面

第一篇 历史背景 (1)

第二篇 铸币机构 (4)

第一章 成都“四川造币厂” (4)

第二章 重庆“铜元局” (6)

第三章 四川军阀防区及民间造币机构 (7)

第四章 甘肃天水造币厂 (8)

第五章 湖北恩施地区及周边铸币机构 (9)

第三篇 版式研究及图谱 (12)

1. 汉字铜元面背元素分解图 (12)

2. “汉”字分解图 (13)

3. 汉字铜元结构总图 (13)

第一章 四川篇版式研究 (14)

第一节 五文 (16)

第二节 十文 (18)

第三节 二十文 (51)

第四节 五十文 (104)

第五节 壹百文 (147)

第六节 第三篇第一章 附录 (175)

附录1. 汉字铜元铸造期间主川官员 (175)

附录2. 四川铜币铸造略历 (175)

附录3. 重庆铜元局沿革(附“局长姓名任期一览表”) (178)

附录4. 成渝厂局铸造铜币用铜 (179)

附录5. 成渝厂局汉字铜元铸造量相关数据 (180)

附录6. 《中国当十铜元》民国内容摘录 (182)



第二章 军私篇版式研究	(184)
第一节 五文	(185)
第二节 十文	(185)
第三节 二十文	(186)
第四节 五十文	(186)
第五节 壹百文	(189)
第六节 第三篇第二章 附录 四川军阀防区制的形成	(195)
第三章 甘肃篇版式研究	(200)
第一节 甘肃版版式结构图	(200)
第二节 甘肃砂版	(200)
第三节 甘肃版机制币	(204)
第四节 第三篇第三章 附录	(206)
附录1. 《天水孔币专辑》摘录	(206)
附录2. 《浅说甘肃造汉字百文砂版中的状元版—“文”字砂版》	(211)
第四章 湖北篇版式研究	(214)
第一节 湖北恩施版版式结构图	(214)
第二节 恩施版基本元素分解	(215)
第三节 湖北纪地系列	(218)
第四节 四川纪地系列	(223)
第五章 趣味品	(243)
第六章 重新定义的汉字铜元	(247)
第七章 近现代赝品	(252)
第四篇 附录	(257)
附录1. 军政府宣言	(257)
附录2. 辛亥革命暨军政府成立年表	(258)
附录3. 汉字铜元中有待探讨的问题	(260)
附录4. 参考文献	(261)
后记	(262)



第一篇 历史背景

一

汉字银、铜元的主题图案设计，直接取材于川东南重庆那段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起义的义旗，图案的设计对那段历史有着十分深刻的纪念意义，记录着一段四川辛亥革命史。

中国近代内忧外患，爱国志士奔走呼号，《革命军》《军政府宣言》以及“保路运动”触动着羸弱的清政府，唤醒了一批批渴望自由、平等，不受奴役的新青年及各阶层进步人士。辛亥武昌起义成功后，民心相向，各省纷纷响应，截至1911年12月初，内地十八省共有十四省宣告共和独立，成立了“军政府”（详见第四篇 附录2）。江西开铸“大汉铜币”以志纪念，此为最早的革命军铸币。地处西南一隅的重庆很快成为了川东及整个四川革命的中心地区，以杨庶堪、张培爵为首的革命党人，加紧发动组织社会各进步力量，筹备起义。是时，获悉革命党人新军排长夏之时率由成都一路收编，不断壮大起义部队，经潼南、合川已抵江北黄角垭，欲与重庆革命党共图大举。即派朱之洪、黄崇麟前往迎接。其后约定，由夏之时率众攻占浮图关，以11月22日为期，在城内接应，以通远门城楼上竖起白布“汉”字大旗为号，开门迎接夏军入城，如果内应不成功，则开炮攻城。朱之洪回城汇报情况后，杨庶堪立即主持同盟会重庆支部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布置这次起义行动。随即一面派人通知与同盟会联络好的各路起义武装力量，一面又赶印各种文告和准备象征新政权的起义物品。周希颜刊刻石质“蜀军都督”“蜀军总司令”两方大印；“同志之妻”绣黄色锦缎大旗一面，旗中绣一篆书“汉”字，外围一圆圈，十八个小圈环绕，作为这次起义的大旗。

1911年11月19日，江津革命党人受重庆同盟会指示，决定江津先于重庆起义，县令吴良桐在革命党人多次晓以大义，识时务地向革命党交出了县印，并在城墙上竖起“汉”字大旗。在高小学堂前壁书写了“蜀军政府”四个大字。江津宣布独立。

1911年11月22日（阴历辛亥年十月初二），杨庶堪、张培爵等集合各路起义武装，全城官、绅、商、学等各界人士

在朝天观举行起义仪式。会场周围汇集群众数千人，重庆知府钮传善、巴县知县段荣嘉慑于强大的革命声势被迫到会，在向楚、朱之洪的监督下，献出了印信，并当即被义军剪去发辫，游街示众，起义一举成功，宣告重庆蜀军政府成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同盟会会员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并通电全国：宣布重庆独立。当日，人们欣喜若狂，敢死队队长况春发腰挎大刀，骑于马上率队维持秩序，威风凛凛的义军和革命者，奔向街头游行庆祝。他们不断振臂高呼：“中华民国万岁”，沿街汇集的老百姓也群情振奋，夹道欢呼。热烈庆祝重庆光复。一面面汉字义旗，全城民众家家悬挂，大街小巷满城飘扬。

蜀军政府是辛亥革命期间，同盟会革命党人在四川重庆建立的第一个省级地方革命政权。重庆蜀军政府的成立，极大地推动了川东地区和整个四川地区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川东南五十七县一致响应，相继宣布独立，并表示归属，接受重庆蜀军政府领导。“汉”字义旗不断在各县竖立起来。11月23日，清晨，永川在鼓楼门前插上“汉”字大旗。11月24日，璧山革命党人联络民众各界力量，连夜布置武装力量，并赶造“汉”字白旗……

重庆的独立，成都“全城震动，军商学界各怀反正之心”。各地保路军包围了成都，人们预计“不出十日，芙蓉城上将白旗飞出”。清政府四川总督赵尔丰为形势所迫而与四川资产阶级立宪派首领、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等订立《四川独立条约》，交出政权，以赵尔丰名义宣布：11月27日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蒲殿俊为大汉军政府都督，新军十七镇镇统朱庆澜为副都督。当地民众“皆竖白旗，围以圆规十八，盖取十八行省”。1911年12月，重庆蜀军政府发布公告，决定西征伐赵，兵分三路向成都进发，22日在成都皇城坝公审赵尔丰，当众尽斥其罪，并令部下将赵尔丰当场诛于皇城“明远楼”，铲除了这个腐朽残暴的清廷死党。并改组“大汉军政府”为“四川军政府”，尹昌衡任正都督，罗纶任副都督。西征军撤回，其后两地军政府经过多次协商，于1912年4月27日成渝两地军政府合并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四川都督府”，由尹昌衡任正都督，张培爵任副都督，重庆镇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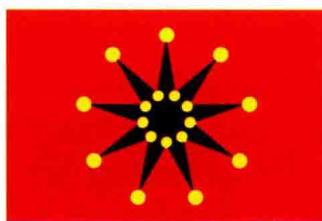


府以夏之时为镇抚总长。

在结束了清王朝在四川的封建统治的同时，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拉开了序幕。1918年正式建立防区制度，驻军就地筹饷，设行发钞，各自为政，行庄不堪困扰，货币金融紊乱为全国之首。1924年后，厂局相继铸造劣质的减重大200文和小200文，1926年年初，在小200文的泛滥中，汉字铜元全线停铸。直到1933年年底，刘湘将刘文辉逼退到雅安后，长达17年的四川军阀混战和所谓的防区制度才告结束，川政统一，军阀铸币史结束。

二

辛亥革命没有统一的旗帜，期间，各省曾先后出现了12种以上，铁血十八星旗是武昌起义胜利的标志，相对晚出的五色旗在1912年胜出，代替黄龙旗成为当时中国的国旗。四川省的义旗是在铁血十八星旗的基础上设计的一款地方特色旗帜，通称：十八星“汉”字旗，又称：“汉”字义旗。铁血十八星旗和五色旗多用在各类开国纪念币上，个别省铸币也有采用，“汉”字义旗仅设计在四川机制币和军用银票上，后有湖北恩施，甘肃天水等地区的革命军、军阀、地方势力，利用受众的四川省机制币形制，大量低仿臆造。在四川机制币中，五色旗设计在军政府造四川铜币五文和嘉穗双旗贰百文（大200）上。为更好地理解钱币图文的设计理念，以下例举四面相关的旗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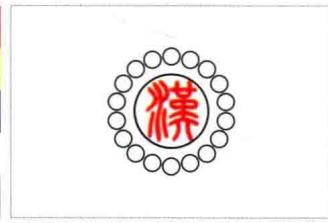
① 铁血十八星旗



② 十八星“汉”字旗之一



③ 五色旗



④ 十八星“汉”字旗之二



1. 铁血十八星旗

铁血十八星旗是影响最大的革命军旗之一，红黄黑三色组成，红底与黑九角象征“血”与“铁”，即革命须抱铁血主义；黑九角代表《禹贡》中记载的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黑九角内外两圈各九颗共十八颗圆星，代表关内汉族聚居的十八行省；星呈金黄色，表示与满清（指的是政府而非满族）对立之汉族炎黄子孙。

此旗只有代表汉人居住的18个行省，是因为晚清时期的革命家对革命有“上下两策”。上策是革命政府收复清朝的全部领土；下策是革命政府由于与满清对立以及当时抱有的汉族民族主义思想，在收复中国本土十八个汉族人省份的主权的同时，对非汉的满蒙疆藏并不是很在乎。清朝政府直到19世纪为止只准许汉族在内地十八省居住。不允许汉族随便迁入居住的有关外的满洲（东三省）、西藏（青海）、蒙古（内外蒙）、新疆。

武昌起义后，全国各地响应。十八星旗在许多省份悬挂。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十八星旗被旗面为红、黄、蓝、白、黑五色，表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取代。鄂、湘、赣三省以及其他省以“铁血十八星旗”作为代陆军旗使用。1912年6月8日，由它衍生出的十九星旗被公布为陆军旗。

注：铁血十八星旗除图例外，同时还有白底，上端内侧占旗面四分之一的红色块内嵌黄色十八星（一面小十八星旗）。它是辛亥革命时期海军实际使用的海军旗，1912年8月1日，被正式发布的海军旗取代。

2. 十八星汉字旗

十八星汉字旗为辛亥革命时期四川独有，尽管它与铁血十八星旗在形式上差距很大，但表达的思想是一致的。《大汉四川独立军政府宣言》称：“大汉四川独立军政府之宗



旨，基于世界之公理，人道之主义，组织共和宪法，以巩固我大汉联邦之帝国而与世罔极。”这个“大汉联邦之帝国”即由关内十八行省构成。

1911年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成立，“民家皆数白旗，中署汉字，周以圆规十八，盖取十八行省之义。”李劫人在其历史小说《大波》中写到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皇城成立大会的场面：“至公堂高高的前轩辕口外，撑出两面写有红汉字，画有十八个墨圈的大旗，是白大绸缝的，在太阳光下闪出缕缕射眼毫光。”英国驻成都总领事对该旗作如下评论：“宣布成立军政府之后，接着升起了新的旗帜。那面旗帜（我想目前中国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是白色的，上面有红色（汉），周围有十八颗星绕成的一个圆圈，形状像是太阳，但颜色是黑的。……旗帜上‘星’的数目是十八颗，而不是二十一颗或二十三颗，这个情况表明把东三省、蒙古和新疆（喀什噶尔）排斥在联邦之外。”目击成都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大会的美籍教师路得·那爱德，为我们留下了十八星汉字旗高悬的老照片。

3. 五色旗

五色旗由红、黄、蓝、白、黑组成，五色旗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含义。

在北洋政府时期，采用五色旗的缘由，多是因为李鸿章的北洋派阀早在满清时期就使用五色旗，北洋陆师、北洋水师均不使用满清的黄龙旗而使用五色旗。而北洋政府多是北

洋系的军人，所以使用五色旗不过是一种沿袭。

在清朝的北洋和新军所采用的五色军旗，又有代表五行一说，代表五方的颜色；又有五色代表仁、义、礼、智、信五德，然而这种说法没有具体的出处。尤其是白色代表智，对于汉语的惯用方法，有些牵强附会的感觉。

1912年5月，北京临时参议院在审议国旗统一案的过程中，五色旗首先获得一致通过。“我中华，民主国；黄龙旗，变五色。”五色旗是古老中国结束封建帝制，走向民主共和的第一面国旗，同时也结束了辛亥革命时期旗帜纷乱的局面。“千秋汉业同天水，五色雄旗映日殷。”朱德1916年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江苏都督程德全及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等认为：五色旗之创意根据中国文化用五数之习惯，以红、黄、蓝、白、黑五色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联合成大共和国之至德，寓意甚当。且外国人视五色彩旗为虹旗，虹现而雨霁，虹旗出则象征一扫封建专制政治制度之阴霾，以实现政治清明。国旗不能没有，法定国旗又未产生，已获国旗提名的五色旗便成了实际上的代国旗。表达了一种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观念。

1928年12月，张学良东北易旗，五色旗在全国范围内被青天白日旗取代。然而，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它成为末代皇帝和汪伪政府的傀儡符号，直至抗战胜利，方退出历史舞台。



孙中山先生与《军政府宣言》



第二篇 铸币机构

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川滇黔各地军阀，都把造币厂视为军饷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因而在四川军阀战争中，成都的“四川造币厂”和重庆的“铜元局”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一经占领，不是自兼厂(局)长，就是委托亲信掌管。厂(局)长频频易主，模具质量低下成为汉字铜元诸多风格、版别的原因之一。同时，川内各地大小军阀绅商争相开办造

币机构，防区制形成后，更趋于“合法化”。甘肃天水军阀和湖北恩施地区的地方军阀及革命军等也在辖区仿造滥造了批量的汉字铜元，影响深远。以下就生产“军政府汉字铜元”的铸币机构分别摘录介绍。

第一章 成都“四川造币厂”

成都造币厂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六月购进美、日机器（日本还是德国有争议），设立银元局，次年厂房落成（一洞桥街）。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正式开铸银元，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试铸铜元，日出数合制钱五六百串（钏）。光绪三十年（1904年），四川银、铜元局独立核算，划分为四川银元和四川铜元两局，两局原有设备略有增添。每天亦铸造五六百串。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又将银元铜元两局合并为“四川银铜元总局”，附设于成都机器局。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将全国17省的20多处厂局裁撤，归并为9处，统为户部管辖，四川银铜元总局更名为“四川户部造币分厂”下设银元股、铜元股。同年9月，清政府的户部改名为“度支部”，又将“四川户部造币分厂”更名为“度支部造币蜀厂”。清宣统二年（1910年），度支部又将造币蜀厂划归天津造币总厂管理，更名为“成都造币分厂”，并与机器局分开，各立门户。厂房、机器归部有，“成都造币分厂”，这一名称一直沿用到民国初年。1912年12月，更名为“财政部四川造币分厂”。

辛亥革命后，四川大汉军政府成立，财政部委谢正权接收了“度支部成都造币分厂”更名为“四川造币厂”。

辛亥年十月十八日（1911年）兵变时，造币厂幸未遭受洗劫，机器设备完整，得以迅速恢复生产银元和铜元，流通市面。但市面经济秩序遭受破坏，百业萧条，购进银、铜原料颇感困难。尹昌衡都督曾饬令各州县设法购济，以免影响铸币。当时有峨眉山古庙金顶寺住持僧慧源，将该寺原大殿

上所盖之铜瓦（因火灾卸下）及其他废铜共计四万余斤，星夜运来成都，亲自呈缴军政府，作为铸造银元、铜元的原料。并声称该庙所存古铜器甚多，深恐遭受劫掠，请求军政府保护。尹昌衡喜甚，对该寺住持奖慰有加，准予出示严加保护。这批铜瓦和废铜如按当时造币厂铸造的当五十文铜元（重五钱）计算，至少可铸造一百数十万枚，即解决了造币厂需铜铸币的燃眉之急，也为军政府提供了一大笔军政费用。（《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

民国元年（1912年）4月，废除大清模式，开铸汉字铜元系列之10文、20文。同月26日，四川财政司与成都造币厂联合公告，添铸每枚重五钱的50文铜元一种，与原发当10文、20文铜元同步行使。

“民国元年（1912年）川督尹昌衡，……并令成都造币厂，每天铸造一万串钱的铜元。乱兵之后，赤铜缺乏，因此降低了铜元的质量和重量……”（《四川文史资料选集》第二十九辑）

清末造币厂所铸铜元，系用紫铜铸造，成分铜九五、铅四锡一。铜质纯洁，铸工精细。民国以后，政府度支日绌，又因钱价降低，铸造时即多加锡，改作白铜，成分降为铜七铅三。当时开铸的“当十文重二钱，当廿文重三钱，加铸一种当五十文重五钱，……”（《四川金融风潮史略》）

民国二年（1913年）7月，成都钱荒，川督兼民政长胡景伊令成都造币厂添铸重五钱八分的当一百和重七钱的当二百大铜元，以济军需。其铸造数额，当一百铜元九百六十余



万枚，当二百铜元一百九十五万余枚如将全年铸造各种铜元总额折算为钱文，竟达三十二亿多文，这就相当惊人了。（《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

民国三年（1914年）2月17日，停铸50文铜元（注：数据显示，并未停产。详见四川篇附录5《成渝厂局汉字铜元铸造量相关数据》）。7月26日，财政部以近来各省铜元铸数大增，供过于求，价格低落，分别限制各厂局铜元铸数。四川因军票兑现的需要，成都分厂暂照旧每日铸7千串，但该厂应即停铸当50铜元。

“民国初年，成都造币厂铸造银铜货币，尚遵照北京政府财政部控制货币质量与数量的各项规定。如铜元十文重二钱，二十文重三钱，五十文重五钱，均采用上等赤铜。所拟铸数量，亦必须报部批准。铸造假币，亦有条款规定，控制更严。护国之役以后，四川局势尤为混乱，因此在军阀占据下的成都造币厂，就领先铸造劣币。降低质量、减轻重量、扩大面值、增大数量。影响所及，各地军阀均设厂私铸，质量之低、重量之轻、数量之无限扩大等等，更有甚于成都造币厂。由此劣币之为害泛滥全川矣。”（《四川文史资料选集》第二十九辑）

民国五年（1916年），政府决定复铸当100文、200文铜元。质量更低，物价愈涨。

民国六年（1917年）罗佩金、戴戡主川，完全停铸当十、当二十铜元，只铸当五十、当百、当贰佰三种大面值铜元，总数突破5 500万枚。（引自《四川钱币研究》）

同年1月8日，川省议会决议，炼铜所应停止销毁制钱供军用，并禁铸当100文、200文铜元。请省长公署转令财政厅照办。省长张澜复文称：加铸当100文、200文铜元，系因四川省财政枯竭，浚券待兑甚急，势必如此搭造，以轻成本。

民国七年（1918年）3月，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熊克武并理军民政务后，任吴秉钧为四川造币厂厂长。8月1日，停铸100文、200文铜元，军政府造双旗五文面世。

民国八年（1919年），熊克武主川时，停铸了当一百和当二百的大铜元，只铸当二十、当五十两种，并铸有当五铜元五万九千余枚（民国七年成厂造有五文铜元四十一万一千九百一十四枚）。此后的三年中，当二百铜元虽有两年未再铸造，而当一百铜元却有两年的铸造数都在一亿枚以上，数字之大，十分惊人。可见当时四川军政首脑们掌握了铸币特权，需要多少，就铸造多少，没有限额，可以肆意滥铸。（《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

民国八年（1919年），曾在短时期内停铸当百、当贰佰，只铸当五（背双旗）、当二十、当五十，三种铜元，然时隔不久，又大量鼓铸当百铜元。（引自《四川钱币研究》）

民国九年（1920年），熊克武通电声讨唐继尧、吕超

等乘乱入川，强占造币厂，强夺川省财权。12月30日，熊克武通电自行解除四川督军职，认为吕超本年入省后，仍铸当100文铜元不妥，建议应改铸当10文、20文行使。

民国十一年（1922年）5月1日，刘湘在重庆就任川军总司令兼省长，调王兆奎旅进驻成都造币厂，委任曾子唯为造币厂厂长。各军及省议员不满，刘不得已，令王旅于今日开拔，邓锡侯随即派兵进厂。

民国十年、十一年百文的铸量均在1亿枚以上。（引自《四川钱币研究》）

民国十三年（1924年）6月12日，杨森于2月14日攻占成都后，经大总统令派，今日就任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掌握成都造币厂……

民国十三年（1924年）杨森统治成都，其造币厂厂长是由西川道尹王岳生调任，他将重五钱八分的大一百改为重二钱七分的新一百，用减轻重量的手段攫取余利，甚至把当二百铜元铸造了一亿四千多万枚。从此当二百铜元，每年铸造数都在一亿几千万枚左右，当二百铜元就开始充斥市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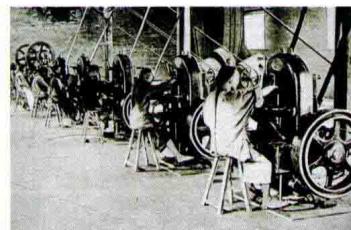
民国十四年（1925年）8月，横遭进城乱兵劫掠，所以库藏银铜被洗劫一空。

10月，杨森统一之战失败，退出省城。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进入成都，邓（二十八军军长）夺得造币厂，自兼厂长，由张民岩以总务科长代行厂长职权。

民国十七年（1928年）3月，二十军委任陈静珊为厂长。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9月四川善后督办刘湘委任颜仲卿为厂长。

……



成都机器局铜币厂1898年7月开铸时场景
美·强必尔拍摄



第二章 重庆“铜元局”

重庆造币厂与省厂先后建设，1905年总督计划在重庆附近建立一座造币厂铸造铜元，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落成（现苏家坝位置），有英制和德制设备各一套，厂的建筑为中式平房，就倾斜地形筑成两台，上台为局址，下台就英制和德制设备各建厂对峙，故有英厂、德厂之称，厂房建成后，德制设备首先安装好，而英制厂房则原封未动。德制机械虽安装好并进行运转，但在接到北京关于停铸的命令时便停止了。

辛亥革命后，委任局长，民国二年（1913年）初春，闲置了七年的设备开工铸造铜元，产效极高。

1926年7月24日《中国经济新闻简报》第4卷第283期写到：“……1913年恢复铸造，当时铸造了当二十铜元。后来铸造了当五十、当一百和当二百的铜元，市场现在泛滥着大铜元，有损于当地的货币体系。”

重庆铜元局因为产能、产量均相当高，因此成为各派军阀争相夺占的重要单位，本为便民兴商而设立的造币厂完全成了私人发财的名利场，以致从1906年建设成立到1926年被国民政府彻底整顿的20年间，历任局长多达30人，其中在任最短仅一天，更有未上任者。（详见第三篇·四川篇附录3）

民国二年（1913年）1月，重庆铜元局开铸铜元。8月，……北洋政府财政部闻讯，令四川省民政厅长速命成、渝两地厂局，立即停铸当百、当五十铜元。但此时，四川境内军阀混战不停，各地催索铜元以应军需甚急，成渝两地厂局在经过短暂的沉寂后，又继续恢复当百、当五十铜元的铸造。根据《民国时期货币金融纪事》记载，“1914年2月11日，川民政长电复财政部，重庆铜元局自上年1月开铸至同年11月止，共铸当10文铜元1 900万余枚，当20文铜元1 996万余枚，当50文铜元938万余枚，当100文铜元117万余枚。”

民国三年（1914年）1月21日，财政部电川民政长，转令重庆铜元局停铸当100文、50文，以维币制。2月17日，再电川民政长，已令成都造币厂停铸50文铜元，希速令渝局同时停铸。3月28日，铜斤铸料吃紧，无款订购。

民国四年（1915年）3月，财政部令吴夐（xiòng）接收重庆铜元局后，只准将余铜铸尽即停工。经军、政、商电请继续鼓铸，以济军饷，维持市面，即照成都厂的成色重量，

铸50文铜元一种。继因川战不休，1920年王雨农任局长时，铸8钱重的当100文铜元，鲜特生任局长时改重量为7钱，1924年杨永懿接办，再改重量为6钱。且铜少铅多。9月，奉部电，重庆铜元局改归财政部直辖。12月，重庆铜元局因北军陆续来渝，各军士兵纷纷到局调买铜元，专设临时兑换所办理。

民国五年（1916年）2月，重庆铜元局奉令，每月拨济军饷铜元5万串，因滇铜不济，原料无着，奉部令改为收购钱铜熔铸，但质杂性脆，破片愈多，铸数愈少。10月，铜元局缺铜，现金吃紧。

民国七年（1918年）3月，熊克武委张治祥接办重庆铜元局。9月，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熊克武令各军饷款在各驻防区内就地划拨，四川军阀的防区制度逐渐形成。（注：从此防区军阀铸币趋于“合法”化。）

同年，云南总督唐继尧继蔡锷之后，反袁护法（《临时约法》）率领护国军（滇军）进驻重庆，在重庆召开滇川黔三省联军会议，并就联军总司令职。为纪念这一盛事，重庆铜元局铸造一种唐继尧头像的马兰币。

民国十一年（1922年）6月，重庆铜元局局长刘炳勋奉川军第二军军长刘湘令，军饷紧迫，开铸当100文铜元。

民国十二年（1923年）12月15日，重庆铜元局因军阀征战不息，一年内，局长更换达16人以上，有在任一天的，有在任几天的。至今日，局中已六日无主。

民国十三年（1924年）2月1日，袁祖铭进驻重庆后，派军需杨永懿（字德淳）任铜元局局长（1924—1926年），借商债30万，收购铜料及制钱，今日开工熔铸当20文、50文铜元。盈利除偿债外，专作黔军军饷。6月8日，铜元局停铸日久，急待复工，但历年债务已达140余万元，现又与债权较巨的中和银行新订合同14条，借款30万元，专供购原料之用。合同规定，将每日所铸铜元全交中和银行，每比期结算一次，以每月盈利的三分之一还中和旧债，三分之二由局报解。

成渝厂局铸造铜元规模庞大，据1924年6月11日（177号）《中国经济新闻简报》记载，成都、重庆两厂每年耗铜8 000吨，其中大部分用于铸造铜元。

民国十四年（1925年）3月30日，袁祖铭令铜元局局长杨



永懿，切实裁汰冗员等。

民国十五年（1926年）1月4日，重庆总商会向四川善后会议建议停铸当200文铜币。建议书称，当200文铜元始由蓉厂鼓铸，今渝厂亦复仿造，一时物价飞腾，渝中罢市数日。请政府先将当200文铜元停铸，销毁模型，再遂部章，添铸当10文、20文小币，救济金融。（注：此段历史资料可证明在民国十五年上旬，“小200”盛行之初，为平抑物价，添铸当十文和二十文汉字铜元。有小二百被改铸特大字二十文实物为证。至今未能见到生产数据。）

同年5月20日，袁祖铭被迫离渝后，刘湘所部师长王陵基（字方舟，后又任重庆卫戍司令），自兼铜元局局长。一面收购制钱及50文以下小铜元，一面由商号垫款购运原铜，

大量改铸100文、200文小铜元。不仅弥补了该局一年间亏损的30余万元，还盈余10余万元。

同年，刘湘派参谋长杨芳毓，将重庆铜元局所存炼钢电炉全套设备及修理设备搬运至磁器口设钢铁厂。又利用铜元局的压片设备制造子弹。

.....

成渝厂局的编年史料主要摘自《民国时期四川货币金融纪事》

注：除以上提及的铜元局局长外，还有李哲夫、蒲季和、吴明远（李、蒲、吴三位局长为北洋军阀嫡系）、李乐伦、熊峙帆（李、熊二位局长任于熊克武主川时期）等。
(详见第三篇·四川篇附录3)

铸币
机构

第三章 四川军阀防区及民间造币机构

民国成立后，民间私铸“机构”便伴随出现，时有被查抄禁止的。防区制形成后至民国政府成立前，军阀和民间私铸机构川省林立，只为军饷及私利，不顾民生计，私铸之盛，范围之广，危害极深！以下是从各类文史资料中摘录的相关汉字铜元内容，仅供参考。

1913年3月8日，四川财政司据报，开县发现私铸劣质铜币在市面掺杂行使，除令该县严密拿办外，并通令各县认真查禁私铸铜元。（《民国时期四川货币金融纪事》）

“自民军兴以后。无年不内战频仍，军民财政四分五裂，大而师旅团部，小而县署乡场，无不自购手摇机。收买制钱，任意滥铸，以供支使。”（《四川金融风潮史略》1933年中国银行重庆分行编，《四川月报》1936年第四期第六卷）

民国六年（1917年），川省境内各军阀创就地筹饷先例。先是省长戴戡准督军罗佩金函，于2月17日训令驻防外县军队就近拨领军饷；10月4日，川财政厅对据第一军军长刘存厚命令，训令各军队饷款在防区内征局划拨。防区名称开始见于公文，全省金融在各个防区内更加混乱。

民国七年（1918年）9月，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熊克武令各军饷款在各驻防区内就地划拨，四川军阀的防区制度逐渐形成，军阀铸币趋于“合法”化。

民国十五年（1926年），民国四川省私厂林立，川中各师、团、县、乡争铸劣币，四川各部为筹款维持开销，在各自的防区内，几乎都有自己的造币机构，或以简单机具，滥造各种劣质银元、铜元，约计全省的造币机构不下40处，钱币达70种之多。以至民国中后期川币之多之滥简直到了惊世

骇俗的地步！使四川币制混乱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民国时期四川货币金融纪事》）

民国十六年（1927年），成都币制更见紊乱，据《四川军阀铁蹄下民众之呼声》揭露：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及各所部，在成都、灌县（今都江堰）、遂宁、雅安、高县、重庆、合川、广安、宜宾、广汉、中江、新津、彭县、江北、合江等地的造币厂（或称银元厂）达28处。所造劣币，害苦了人民。

民国十七年（1928年）1月7日：“军队所驻之地，无不私设币厂，以省城近郊已达80余厂之多，边远则不计其数。.....复熔改铸牟利，良币殆尽。”（《中国新闻简报》第12卷第一期）（笔者注：1928年为民国十七年，正是小二百泛滥时期，也是军私铸造机构最鼎盛期。）

“.....在成都附近，有造币厂十多家。旅长刁文俊在贵州馆街旅部设厂，师长邓国璋在灌县设厂，师长陈书农在简阳设厂，旅长谢德戡在温江设厂，旅长李注东在外东设厂，路司令何瞻如在安县设厂，军长刘自乾在雅州设厂，路司令曾南夫在三桥南街设厂，还有其他边远地区也设厂铸造，就不胜枚举。一时市面上涌现出五花八门的新货币，有所谓川板、新川板、钢板（刘元塘在会理铸造）、雅板（刘自乾在雅州铸造）、周板（周西城在赤水铸造）、渝板（刘甫澄在渝铸造）、合川板（罗泽洲在合川铸造）.....”《四川文史资料选集》（第二十九辑）

军阀非法私铸，欲壑难填！成都官、商、党部及民众团体，在军警团联合办事处联席会上决议：.....除成都造币厂与重庆铜元局为合法铸造机关外，由政府派兵会同民众捣毁



各私铸机关，并没收其机械及一切财产，将主办人交政府严办……（《民国时期四川货币金融纪事》）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年底，刘湘将刘文辉逼退到雅安后，长达十七年的四川军阀混战和所谓的防区制度才告结束。

根据史料记载，设造币厂的军阀还有：刘文辉修械所和雅安防区，曾收买章牌所制模技工，并取走成都造币厂半圆铜模；刘元塘（旅长）在会理设厂（钢版）；李家钰入城时占据成都造币厂趁机窃走半圆铜模，交一部分给其弟李注东，在忠烈祠街司令部和城隍庙驻地内私铸钱币，后又在遂宁防区设厂私铸；谢德戡（旅长）占据外南倒桑树街四川机械厂私铸钱币，同时在温江设厂；罗泽洲在顺庆、合川设厂（合川版）；邓国璋在郫县、灌县设厂；黄逸民在灌县设厂；杨荣向在金堂设厂；王岫生（炮兵指挥官）在成都设厂；陈书农在合川、简阳设厂；何瞻如在安县设厂；曾南夫在三桥南街设厂；王陵基在万县设厂；刘自乾在雅州设厂（雅版）；刁文俊（旅长）在贵州馆街旅部设厂；刘甫澄在渝设厂（渝版）；刘存厚在达县设厂。1933年10月，红军开展宣（汉）达（县）战役，一举摧毁了川东王、老军阀刘存厚多年经营的老巢，缴获达县造币厂全部设备、原材料在内的物资运到通江……另外，杨森、刘存厚、李家钰等部亦在兴文县、崇庆、汉源、南部、达县等地设厂。

另有其他边远地区的军阀也设厂铸造，入川东南的秀山、彭水等地，他们主要采用土法铸造。

除川内各厂外，还有三省多个地区生产着相同内容的汉字铜元——湖北恩施地方、军阀、革命军，甘肃天水军阀及

贵州赤水军阀等。贵州铸造的情况和版式目前依然模糊，暂收录相关资料如下：

“民国十二年（1923年），周西成任川军十二师师长。民国十三年率黔军第三师进驻赤水，并任军务善后会办。”（《赤水县志》人物篇）“……周西成进驻赤水后，不久即开始自铸银元，造币厂设在三府庙，即今纺织品公司地址。银元模具来源有两种说法，一说来源于成都的川汉版十八圈纹模；一说来源于周西成打重庆铜元局时即带来，也是汉版十八圈模具，两者均有可能，但以后说可能性较大（笔者注：史料记载周西成三次占领铜元局）。赤水造币厂在祖模上加一周字，就为赤水首铸银元，民间呼为‘周大洋’，此币成色较差，除缴纳钱粮十足准用外，在市场上一般都要敷水三百文，毗邻的泸州、合江等地，有的拒用，有的准八折流通。‘周大洋’的发行，主要靠二十五军军部内设的金库，金库地址在今县政府的旧大楼，原太极楼内，其次是通过裕国钱庄发行。”（《赤水金融志》金属货币发行及《贵州赤造银元“周大洋”》袁泽君）

贵州赤水曾经铸造过军政府汉字一百文、五十文。赤水造铜币主要特征与“重庆版”类似，但重量比成都、重庆版略轻。最大区别在于“军政府造”四字刚好与川版相反。川版一百文为大字，五十文为小字，而赤水造一百文为小字，五十文为大字。（《收藏》2010年12期，《赤造“汉版十八圈”铜币》）

湖北和甘肃两地所铸造的铜元内容虽然与成渝厂局的相似，但设计、工艺有较大的区别，铸造质量相差甚远。相关内容摘录请参考第四、第五章。

第四章 甘肃天水造币厂

关于甘肃民国铸币，各志记录较少，且出入较多，甘肃藏家、学者刘大有先生经过多年走访考察，著有《天水孔币专辑》，辩证地叙述了这一史实（详见甘肃篇附录《天水孔币专辑》摘录），以下按编年的顺序摘录了一些县志上的相关内容，仅供参考：

清末，甘肃省未设造币厂。

民国八年冬（1919年），甘肃督军兼省长张广建任命陇南清乡督办孔繁锦（有“陇南王”之称）为陇南镇守使住防天水，辖天水等十四县。孔带三营省防军抵达天水。（十四县：天水、通渭、武山、甘谷、清水、秦安、徽县、两当、西和、礼县、成县、武

都、文县、舟曲。毗邻四川、陕西，面积达三万多平方千米，时人口近200万，有回、汉、藏等民族）

民国九年（1920年），孔繁锦下令销毁制钱，范铸五十文、一百文砂版铜元。在天水市秦城区建立甘肃第一家铜元厂。厂址前厂在原钟楼巷隍庙背后，多为天水和山西匠人。后厂在桑园（今解放电影院后），尽是河南工匠，桑园设有孔的大马号。（《天水孔币专辑》）

天水县志（卷之五货币，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庄以绥、贾缵绪著，兰州国民印刷局）记载：“九年（1920年），镇守使孔繁锦销毁制钱，铸五十、一百、二百之砂版铜元。”